



汉代在文章样式重大主题方面确立的范型

李炳海

摘要:汉代所确立的文章样式范型,是在继承战国文学已有成果基础上实现的。设辞是由无韵无题的短章发展为有韵有题之鸿文,九体是从章无标题演变为章末缀目,七体是铺陈对象由变数凝固为常量,连珠、先文后诗的文章样式则是由浑然一体演化为剥离成文。汉代确立的重大文章主题有八种,分为四组,依次是悲士不遇与圣主得贤臣颂、盛世颂歌与刺世疾邪、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灾异示祸与符瑞显德。这几种重大文章主题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彼此构成因果关系、依存关系、两极互补关系三种类型。

关键词:汉代文学;确立范型;文章样式;重大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2-0057-11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期。汉承秦制,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封建帝国。这种体制在中国古代延续两千余年,是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汉代文学在中国古代也具有垂范后世的作用,处于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某段历史进行评价,既要考察它做了哪些事情,更要考察它提供了哪些前代未曾有过的有价值的东西。汉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对一系列文学范型的确立。通过对汉代所确立的文学范型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汉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即它在继承先秦文学的基础上又有哪些超越,这些超越又如何垂范后世。汉代对文学范型的确立是全方位的,可以划分为多个系列,下面主要从文章样式、重大主题两个维度切入,探讨汉代文学所确立的几个范型。

一、文章形态的凝结固化

汉代文学确立范型有些体现在文章形态方

面,许多文章的形态在汉代进入稳定阶段,是文体的凝结固化时期。

汉代的主要文类是赋,章学诚在追溯汉赋源头时写道: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诸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1064}

章氏所持的赋类文章多源论的理念,其说可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战国有些文类如何在汉代定型,中间经历了哪些转换方式。

(一)设辞:从无韵无题的短章到有韵有题之鸿文

汉代确立的重要文体形态是设辞。这类文章采用的是主客问答的方式,抑客而扬主。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解难》、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问》、蔡邕的《释海》,均是属于这个系列的文章,文体形态基本相同,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汉代设辞类文章的直接源

收稿日期:2021-12-08

作者简介:李炳海,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头,可以追溯到以宋玉为主角的两篇对话文章,均收录在刘向所编的《新序》一书中。第一篇文章是“楚威王问于宋玉”^{[2]25},第二篇是“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2]170-171}。《文选》卷四十五收录上述第一篇文章,标题是《宋玉对楚王问》,楚威王,作楚襄王,应作襄王。如果把汉代设辞与《新序》所载以宋玉为主角的主客问答体文章相对比,会发现三方面差异。第一,《新序》所收录的与宋玉相关的两篇文章,原来均无标题,至于第一篇文章称为《宋玉对楚王问》,是《文选》编者所追加,或称为《郢中对》,题目亦是后人所追加。汉代设辞则是各篇均有标题,而且文题与文意相契,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结果。第二,《新序》所收录的以宋玉为主角的问答体文章是两则故事,篇幅短小,而汉代的设辞则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属于巨制鸿文。第三,以宋玉为主角的两篇文章是无韵之文,而汉代设辞则追求声韵的和谐,往往句尾用韵,还有运用五言韵语的段落。由此可见,汉代人是在以宋玉为主角的问答体文章为基础,作了三方面的增益,从而形成设辞体系列,并且最终定型。《骈体文钞》卷二十八收录的汉代以后设辞体文章,有晋束皙的《玄居释》、皇甫谧的《释劝论》、夏侯湛的《抵疑》,采用的均是汉代设辞的体式^{[3]559-567}。

(二)九体:从章无标题到章末缀目

汉代骚体赋有九体,传世文献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九体文章是王褒的《九怀》。全文共九段,每段末尾都缀以标题,依次是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继《九怀》之后,刘向有《九叹》、王逸有《九思》,所采用的体式与《九怀》相同。九体作为骚体赋的一种样式,它的形态范型在汉代已经确立。

提到九体,人们自然首先联想到篇名冠以九字的战国楚辞类文章,通常都从那里追寻九体的源头。屈原所作的《九歌》系组诗,共十一篇作品,诗篇的数量与组诗的名称不相一致。屈原的《九章》也是组诗,虽然诗篇的数量与组诗名称相符,但是,各首诗独立成篇,无法组合成一篇文章。宋玉的《九辩》在体式上与汉代的九体最为接近,朱熹把它划分为九段^{[4]119-131},其说可取。然而,《九辩》各个段落均无标题,如果加上标题,就与汉代九体的样式不存在差异

了。汉代九体样式的直接源头确实是《九辩》,它是在《九辩》的基础上各段缀以标题,从而确定了九体样态的范型。

(三)七体:从变量到常数

枚乘所作《七发》是汉代散体赋的奠基之作,李兆洛称它:“楚人之遗则,源亦从《招魂》,《大招》出耳。”^{[3]569}这是把《七发》的源头追溯到战国楚辞的《招魂》《大招》。鲁迅先生亦称:“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5]53}把《七发》的源头追溯到《招魂》《大招》,确实有其道理,因为这三篇文章都是列举多种美好事物进行诱导。《招魂》《大招》是诱导游魂返回故土,而《七发》则是吴客对楚太子进行诱导。不过,如果对三篇文章用以进行诱导的美好事物按照种类进行量化统计,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招魂》用以诱导游魂归来的美好事物共有三大类,即居处之乐、美食之乐、女乐游戏之乐。在铺陈居处之乐的前边一个段落,叙述的是进行招魂的方式,与后边三个板块出现的欲望对象的美好事物不属于同类,因此,《招魂》用于诱导游魂归来的美好事物是三大类。《大招》列举美好事物呼唤游魂归来,首个段落如下:“魂魄归来!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穷身永乐,年寿延只。魂乎归来!乐不可言只。”王逸注:“言居于楚国,穷身长乐,保延年寿,终无忧患也。”^{[6]219}这个段落是叙述楚国安定的环境,对游魂进行呼唤,意谓返回楚国可以意定神安,能够终生欢乐,延年益寿。这是诱导游魂归来的第一种美好事物。《大招》在这个段落之后所列举的美好事物,依次是饮食之美、女乐之乐、居处之乐、政治昌明之美。这样看来,《大招》从正面诱导游魂来的文字共五个段落,列举五类美好事物,与《招魂》的以三类美好事物相诱导在类别数量上明显不同。

《招魂》《大招》所出现的用以进行诱导的美好事物或是三类,或是五类,数量上不固定,属于变数。再看《七发》及汉代七体文章。关于《七发》,《文选》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7]478}枚乘《七发》列举七类美好事物用以启发楚太子,这种写法确实可以溯源到《招

魂》《大招》。然而,《七发》并没有完全沿袭《招魂》《大招》的文章格局,而是作了调整:一是所列举的美好事物的总体数量增多,由三种、五种增加到七种;二是所列举对象的类别有较大变化,其中的广陵观涛,要言妙道等,都是《招魂》《大招》所未曾出现的。

从《招魂》到《大招》,对美好事物所作的铺陈,在类别数目上呈现的是变量,即数量不确定。而汉代自《七发》问世之后,七体文章的姿态遵循相同的结构模式。傅玄《七谟序》有如下论述: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8]1020}

汉代文坛出现的这种状况,表明七体作为一种文章样式,它的基本形态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不再有大的变化。汉代所确立的七体文章样式,在后代一直沿用。《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在收录汉代七体文章之后,又对从曹植《七启》到萧子范《七诱》等八篇文章予以著录^{[8]1027-1035},采用的均是七段成文的结构模式。直到清代,由汉代确立的七体范型仍在沿用,李焘伯的《七居》即是其例证^{[9]907-909}。

(四)连珠、先文后诗:从浑然一体到剥离成文

最先把连珠作为文章名称的是扬雄,而真正使连珠体得以确立的是班固。班固有《拟连珠》五首传世,其中四首只存片断,只有一首完整地保存下来:

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王之功。故珣璠之为宝,非驯佞之术;伊尹之为佐,非左右之为旧。^{[10]111}

这篇《拟连珠》属于袖珍型文体,篇幅短小,运用偶句,以比兴发端,多格言警句,累累如贯珠。关于这种文体的起源,通常把它追溯到《韩非子·内外储说》。李兆洛称:“此体昉于《韩非》之《内外储说》,《淮南》之《说山》。”^{[3]591}近人林传甲亦称:“《内外储说》实连珠体之所昉,《淮南·说山》即出于此。汉班固以后,遂递相模仿

矣。”^{[11]294}把连珠体的源头追溯到《韩非子》,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该书《内外储说》的各篇开头段落,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确实与后来的连珠体相似。除此之外,《庄子》《文子》《礼记·中庸》等先秦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类似段落。如《文子·符言》:

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杀。甘井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见害,人希名而召祸。华荣之言后为愆,先骋华辞,后招身祸。^{[12]177}

把这个段落与前边所录班固的《拟连珠》相对比,两者相似之处颇多。连珠体的多种基本属性,在《文子》的这个段落中均已具备。在西汉文献中,《淮南子》的《说山训》《说林训》《说苑·谈丛》,也可以见到类似段落。不过,在扬雄正式以《连珠》为文章标题之前,这类段落是以散金碎玉的方式分布在文章中,是整篇文章的组成部分,还没有独立成篇。扬雄使连珠体具有独立性,班固则进一步从文章形态方面加以规范,从而形成固定的文章样式,为后世确立了文体范型。《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在收录扬雄、班固的连珠体文章之后,又依次收录了从东汉潘勖到南梁刘孝仪的一系列这类文章^{[8]1036-1039},体式基本相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珠体已由附庸变为大国,文章数量颇多,蔚为壮观,所遵循的均是班固确立的文体范型。

汉代所确立的文章样式的范型,还有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这个范型最初是由刘向确立的。他所编纂的《列女传》每篇文章分前后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对传主的情况进行叙述,援引《诗经》的句子作总结;第二个板块是刘向所作的“颂”,通常是八句四言诗,如卷一《有虞二妃》作为文章结尾的颂是如下诗句:

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祐。^{[13]2}

这八句诗主要是复述前边叙事已经讲过的内容,表达自己对传主的评价。这篇传说前边是散文,后边是诗,明显分成两个板块,两者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列仙传》也是出自刘向之手,这部仙话集各篇文章采用的仍然是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前边叙述传主的成仙故事,后边用

八句四言诗加以复述。

先文后诗的文章格局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它的雏形。《楚辞·渔父》前一部分叙述屈原和渔父的对话,后一部分是渔父唱着《沧浪之歌》而离去,基本是一篇先文后诗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叙述渔父所唱的《沧浪之歌》的后边还有如下交待:“遂去,不复与言。”^{[6]181}真正作为文章结尾的不是诗,而是文章作者的叙述性语言。《战国策·楚策四》收录了荀子写给春申君的一封信,前边是援引历史典故进行议论,然后是荀子所作的赋,其实是一首诗,《荀子·赋篇》所载的《倦诗》把这首诗收录^{[14]567-572},字句稍有不同。从总体上看,《楚策四》收录荀子的书信,呈现的是先文后诗的格局。然而,这封信并不是以荀子所作的诗结尾,而是后边还有如下句子:“《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15]567}这是援引当时流传的《诗经》句子进行议论,整篇书信从是否自作的角度考察,不是严格意义的先文后诗格局。

先秦文献中已经存在先文后诗的文章雏形,但是,其中的文和诗无法分割开来,置于后部的诗是前边散文叙事或议论的延伸,如果把诗剥离出来,文章就变得残缺不全。另外,这类文章最终结尾的句子往往不是作者所写的诗,而是其他类型的句子。刘向所确立的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则是文章的文和诗作为两个板块,都有相对独立性,已经把置于后边的诗与前边的文作了剥离,两者不再是浑然一体,而是二元并立,相互对应。作为这类文章结尾的文字纯是作者的诗句,剔除了后缀。

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在东汉得到广泛的运用。班固的《两都赋》结尾是五首四言诗,《封燕然山铭》结尾是五句骚体诗,张衡《思立赋》结尾是十二句七言诗,马融《长笛赋》结尾是十句七言诗,王延寿《梦赋》结尾是六句七言诗,赵壹《刺世疾邪赋》结尾是两首五言诗。赋尾附诗是东汉文坛的一种风尚,这种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对五言、七言诗具有孕育作用,“一旦这两种诗体成熟,就开始逐渐脱离辞赋母体,以独立的文学样式出现,诗赋之间的界限也由模糊变得清晰”^{[16]498}。

班固所撰写的先文后诗格局的文章,还见

于《汉书·叙传》。这篇文章前一个板块叙述家族谱系及自身经历,以散文为主,也收录了班固所作的《答宾戏》。后一个板块是对《汉书》各篇内容、主旨所作的总结概括,则是采用诗的形式,末尾一则是三言诗,其余基本都是四言。历史著作的书写采用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还见于《晋书》和《南齐书》。《晋书》的人物传记除《宣帝纪》《景帝纪》两篇之外,其余各篇传记结尾的赞都是四言诗,《南齐书》则是所有人物传记结尾的赞全都是四言诗。不过,这种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在后来的正史系统中没有延续下去。

在整个中国古代,采用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并且世代相承的文类是碑文。蔡邕撰写了一系列碑文,全部采用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前一个板块用散体叙述碑主的生平经历及谱系,第二个板块的铭则是用诗体,主要是四言诗。传世的东汉其他碑文,采用的也是这种结构模式。这种先文后诗的碑文样式,成为后代效仿的范型。韩愈的《平淮西碑》是古代碑文的名篇,尽管它是碑文的变体,所采用的仍然是先文后诗的模式,只是诗的板块篇幅加大,与前边文的板块平分秋色而已^{[17]284-286}。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是刘向在《列女传》《列仙传》中确立的,这两书系传记类文章的结集。这种结构模式开始是在传记类文章中得到确立,后来又在作为传记类别的碑文中世代延续,有其历史必然性。

二、文章重大主题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重大的主题是在汉代确立的,这些重大主题有的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但是处于萌芽、潜在形态,到了汉代才变得明朗,得以真正确立。还有的主题先秦时期根本没有涉及或很少提到,到汉代才真正形成并且得以确立。汉代文学对这些重大主题的确立,在具体文章中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重大主题的确立经由多个渠道。

(一)悲士不遇与圣主得贤臣颂

悲士不遇作为文章主题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屈原的《离骚》《九章》多数篇目,宋玉的《九辩》,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过,明确把悲士

不遇作为文章主题,这个进程是从汉代正式启动的。汉代文学悲士不遇主题的确立,是以对屈原的悼念发端。贾谊作《吊屈原赋》,仅从文章题目就可看出这是哀悼屈原的怀才不遇。文中称屈原“遭世无极”“逢时不祥”^{[18]410},也就是生不逢时,因此造成“乃陨厥身”的人生悲剧。

董仲舒作《士不遇赋》,所用的标题使得悲士不遇主题进一步明朗化。贾谊是通过哀悼屈原表达悲士不遇主题,董仲舒则是直接抒发自身的感受:“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19]146}他感慨自己生不逢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弟子,他的《悲士不遇赋》用篇题把这个主题进一步明朗化。文章慨叹“士生之不辰”,“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19]189}。司马迁把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抑郁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至此,悲士不遇作文章的重要主题正式确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汉代涌现出一大批以悲士不遇为主题的文章,设辞、九体都属于这个系列。还有一些九体之外抒发个人情志的骚体赋,也以悲士不遇为主题。把悲士不遇作为文章主旨,并且通过文章题目加以昭示,这种做法在后代仍然可以见到。陶渊明有《感士不遇赋》^{[20]145-148},明代伍瑞隆有《惜士不遇赋》^{[21]卷三},显然是把董仲舒、司马迁的上述两篇文章作为范型,以悲士不遇为主题而以篇名道其志。

古代士人有怀才不遇之感,还有圣主贤臣相遇的企盼,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屈原的《离骚》《天问》就是如此。战国时期其他文章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明确地把歌颂圣主贤臣相遇作为文章主旨,并且用篇题加以标示,这是在汉代开始的。王褒从蜀地被朝廷征招到长安,“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22]2822}。圣主得贤臣颂这个题目是汉宣帝所定,文章是王褒所写,属于命题作文。文中写道:“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22]2826-2827}这几句话把圣主与贤臣之间互依、互动的关系论述得非常透彻,成为格言警句。韩愈《杂说四》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17]128}这与《圣主得贤臣颂》给出的结论同出一辙。王褒这篇文章是

颂扬君主得贤臣重大主题正式确立的标志,是后代同类主题文章的范型。

(二)盛世颂歌与刺世疾邪

歌颂与批判是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互补性的两类重大主题,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大量这方面的文章。然而,通过文章题目明确标示对现实的颂扬和批判,这个进程还是从汉代真正开始。

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事先为汉武帝到泰山封禅而作。所谓的封禅是天下大治、太平盛世的标志,因此,司马相如这篇文章的题目,标示出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主旨。文中写道:“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沍漓曼羨;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22]2601}对西汉盛世进行歌功颂德,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后来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沿袭的是司马相如的路数。对现实社会歌功颂德而用文章题目明确地加以昭示,这种模式在东汉傅毅、崔駰那里凝固为对天子的赞美。《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记载:“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额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23]2613}《清庙》是《诗经·周颂》首篇,是周族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诗。傅毅为祭祀东汉明帝所作的庙颂借鉴《清庙》一诗,篇名定为《显宗颂》,明显是为明帝歌功颂德。崔駰作《四巡颂》,即《东巡颂》《南巡颂》《西巡颂》《北巡颂》^{[24]99-108}。所谓的巡,这里专指天子巡狩。这四篇文章都作于汉章帝时期,把汉章帝写成圣明天子,把当时的社会渲染为太平盛世。继崔駰之后,马融、刘珍都有《东巡颂》^{[24]108-111},是对汉安帝进行歌功颂德的篇章。把对现实社会的赞美聚焦在天子身上,这种做法始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到东汉傅毅、崔駰等人的颂类文章而最终确立,成为歌功颂德的一种模式。北魏高允的《南巡颂》^{[24]112-114},明显是沿袭东汉的天子巡狩颂。这类为天子歌功颂德的文章在后代颇为常见,可以从上述汉代诸篇颂类文章那里找到源头。

从先秦到两汉,各个历史阶段都不乏愤世嫉俗之士,并且出现数量众多的针砭时弊的文章。这类文章绝大多数选择一个或几个侧面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至于从整体上对社会作全盘否定,进行彻底批判,并且把这种主旨明确地用篇名加以标示,则是始于东汉的赵壹。《后汉

书·文苑列传下》记载: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排斥,乃作《解解》。后来几次入狱,险些丧命,被友人搭救,作《穷鸟赋》,感谢友人。“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23]2630}赵壹这篇赋是在他屡经坎坷之后胸中愤怒的集中喷射,同时也是以批判现实为主题的意义指向的凝结强化,并且通过文章题目明确地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既是对以往批判现实文章主题所作的高度概括,也为后代这类文章确立了主题范型。

(三)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叔孙豹如下话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5]1088}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价值观,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把立言不朽和激赏使者的边功作为文学的重大主题,却是在汉代才开始真正确立的。

先秦时期有一大批追求立言不朽之士,确实有许多人实现了立言不朽。然而,先秦时期有立言不朽之人,却基本见不到以立言不朽为主题的文章。《史记·孔子世家》把孔子修《春秋》的动机归结为“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26]1943}。这是司马迁所作的推测,孔子本人并没有明确地把修《春秋》与立言不朽联系在一起。《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吕氏春秋》成书之后,吕不韦令人在咸阳市场悬赏,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26]2510},暗示吕不韦有立言不朽之意。可是,《吕氏春秋·十二纪》自序,根本没有明确提到立言不朽,只是说这部书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27]122}。大量事实表明,先秦时期的文章还没有把立言不朽作为重大主题。

进入汉代以后,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以立言不朽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在文章或著作的结尾处点明主题,是篇末点题,卒章通其志,而不像以悲士不遇、圣主得贤臣等作为主题的文章那样以篇名道其志。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叙传,放置在全书最后。这篇文章结尾称他对《史记》这部书有如下期待:“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6]3320}显然,这是希望立言不朽,扬名后世。

《汉书·叙传》是该书最后一篇,是班固自述家世及撰写《汉书》的始末。文中称:“故虽尧舜

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22]4235}这几句还是暗示立言可以使人生不朽,名扬后世,他撰写《汉书》的目的也在于此。《论衡·自纪》是该书的末篇,王充在文中称:“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28]287}在王充看来,立德立言是人生的根本,立德是以孔子为楷模,立言要与扬雄比肩而立,以此实现人生不朽。王符在《潜论·叙录》也提到立德、立功、立言,他选择立言:“刍蕘虽微陋,先圣亦咨询。”^{[29]193}他相信自己的著作会有读者,产生反响,把立言作为人生寄托。

设辞是汉代确立的文章样式之一,这类文章往往在结尾表达立言不朽的理念。扬雄《解嘲》结尾称:“默然独守吾《太玄》。”^{[22]3573}扬雄为什么独守《太玄》,班固称扬雄:“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22]3583}扬雄是通过撰写《太玄》等一系列著作,用以扬名于后世。班固的《答宾戏》结尾把自己的人生选择锁定在“故密尔自娱于斯文”,颜师古注:“密,静也,安也。”^{[22]4233}班固是把料理文章作为人生的寄托。他在《幽通赋》称:“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22]4222}班固追求人生不朽,又把写文章作为人生的选择,显然,《答宾戏》结尾表达的正是立言不朽的理念。张衡作《应间》一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自己的心志。文章结尾段落写道:“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于柱史。”^{[23]1908}这里所说的《三坟》《五典》用的是《国语·楚语》的典故,文中泛指古代文献。“柱史”指老子,老子曾在东周朝廷任柱下史,负责管理图书。张衡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与文章打交道方面,其实还是强调立言不朽。

综上所述,汉代文学把立言不朽确立为文章的重大主题,这个进程发轫于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经由扬雄,到班固而最终完成。其后王充、王符、张衡等陆续有这类文章问世。以立言不朽为主题的文章,无论在历史散文中,还是设辞类作品,主题的昭示均置于文章或著作末尾,几乎已成定制。立言不朽的意义指向是未来,把主旨的昭示置于文章末尾,与它的意义指向相契合,可谓顺理成章。“文章千古事”是古代文

人的普遍理念,汉代文学确立的这一重大主题,在后代文学中不时地发出回响。

颂扬外交使者在边塞绝域建功立业,是汉代文学确立的又一个重大主题。清人赵翼称:“自武帝击匈奴,通西域,徼外诸国无不慑汉威……而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30]57}这种气象在先秦时期是见不到的,那个历史阶段外交使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中土之内,西域与中土基本上属于隔绝状态,当然也不会出现在西域建功立业的使者,更无法出现这方面题材、主旨的文章。《史记》《汉书》对于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外交使者,予以充分的肯定,由此确立激赏使者边功的文章主题。

张骞是首位通西域的西汉使者,《史记·大宛列传》详细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的始末,并且用赞扬的笔调叙述张骞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称:“张骞凿空。”裴驷集解引苏林语:“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案,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26]3170}所作的解释大意得之,但是不够确切,所谓凿空,指凿出窟窿,通道。空,通孔,窟窿。《史记·五帝本纪》称“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张守节正义:“言舜潜匿穿孔旁,从他井而出也。”^{[26]35}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这里出现的“空”字,指的是孔,《史记》本身提供了内证。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把张骞通西域的历史功绩从多方面予以叙述,展示出丝绸之路开通之初中土与西域交往出现的崭新局面。《大宛列传》初步确立了激赏外交使者边塞绝域建功的文章主题。

《汉书》卷六十一设张骞传,基本沿袭《史记·大宛列传》的相关记载。《汉书·叙传》称:“博望杖节,收功大夏。”^{[22]4256}亦对张骞通西域予以高度赞扬。《汉书》卷七十是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陈汤、段会宗六人的传,他们都是经营西域的著名外交使者。该传记结尾称:“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迄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22]3032}这是对西汉开启陆上丝绸之路阶段的外交使者群体作出总的评价,指出他们勇敢而又有谋略,是智勇双全的人物。该卷的主旨是赞扬六位外交使臣所建立的功勋,是把激

赏使者边功作为文章主题牢固确立的标志。

东汉经营西域的著名使者是班超,《后汉书》卷四十七设《班超列传》,对于班超经营西域所作的叙述极其详细,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篇末赞语称:“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李贤注:“葱岭、雪山,白龙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为艰,咫尺言不以为远也。”^{[23]1549}这几句赞词昭示了《后汉书》班超传记的主题,就是高度赞扬,充分肯定班超在西域建立的功勋,赞扬他的冒险精神和家国情怀,继承的是《史记》《汉书》同类传记确立的主题范型。

两汉是陆上丝绸之路开启阶段,涌现出一批在边塞绝域建功立业的外交使者,并且使得以激赏使者边功为主题的文章陆续出现,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也是时势造文章。两汉之后,往来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人物不再是朝廷的外交使者,而是商人和僧侣。由此而来,汉代确立的激赏使者边功的文章主题,在后代出现的频率很低。从严格意义看,它真正作为范型而被沿用,到《后汉书·班超传》就已经基本结束。不过,张骞、班超这两位陆上丝绸之路开启时期作出巨大贡献的外交使者,作为历史典故仍然经常出现在后代的各类文章中。

(四)灾异示祸与符瑞显德

古人秉持的是天人相通、天人感应观念,认为人间万象与自然界的灾异祲祥存在对应关系,这种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有明确的表述。《国语·周语上》记载东周王朝的大夫内史过有如下话语: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禘机次于桎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鸛鸛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郾。^{[31]29-30}

这是列举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传说,把祲祥和灾异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礼记·中庸》亦称:“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朱熹注:“祲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祸之萌。”^{[32]33}《中庸》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属于儒学正宗,也是孔子家学的嫡传。先秦文献虽然对于灾异祲祥多有记载,但是不够系统、集中,而是零散地分布

在各种典籍中,还没有成为文章的重要主题,当时人们对灾异祲祥所作的解说也比较简略,很少有长篇大论而构成独立的文章者。

进入汉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大批言说灾异的学人。对此,《汉书》卷七十五结尾写道: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22]3194-3195}

班固提到的上述诸人都是西汉时期的经师,研论“五经”,各有所长,学问上也有高低之分。班固在谷永传记中指出:“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浹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22]3472}西汉推言灾异的经师有的学问渊博,推言灾异颇有学理性,所写的是学者之文。而学术粗疏者则近乎术士,推言灾异则牵强附会颇多。

在古人观念中,灾异和祲祥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汉代的经学著作往往是兼顾两者。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同时提到灾异和祲祥^{[33]45},班固编纂的《白虎通德论》则分别设立《灾变》和《封禅》两个栏目,后者主要论符瑞。推言灾异祲祥是汉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理念是在经学框架内体系化、严密化,并且成为文章的重要主题。

祲祥和灾异在先秦时期就与国家的兴亡建立起对应关系,汉代以符瑞显德、灾异示祸为主题的文章写作背景,也与世道的兴衰大体构成横向对应关系。西汉最早把符瑞集中写入文章的是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为武帝到泰山封禅预先而作。这篇文章不但在正文板块中提到多种符瑞,而且在所附的五首诗中有四首展示符瑞,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符瑞的萃集。班固的《典引》是受《封禅文》的启发而作,其中出现的符瑞数量较之《封禅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崔骃和班固是同时代人,他所写的《东巡颂》《北巡颂》,也提到一系列符瑞。另外,班固《东都赋》后边所附的《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符瑞在三首诗中都是主要展示对象。汉代文学对符瑞集中加以表现的作品,一是出自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之手,二是东

汉明帝、章帝时期班固、崔骃所作。这两个历史时期是汉代的盛世,也是以符瑞显德为主题文章的繁荣时期。以符瑞显德为主题,这类文章在汉代由司马相如首创,初步确立传统。到了东汉明、章之世,则由班固、崔骃等把这类文章的范型稳固地确立下来,基本已成定制,并且一直被后代所沿袭。

如前所述,班固曾对汉代推言阴阳灾异的主要人物进行罗列,总共十位,其中元帝、成帝以后的六位,在三个历史阶段中人数最多。西汉从元帝开始就走向衰落,成帝时期已经进入乱世阶段。与此相应,这个时期以阴阳推言灾异的风气也最盛,并且已经形成体系,代表人物是刘向和京房。班固称刘向:“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22]1972}《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的《五行传记》十一卷,他是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灾异,形成完整的体系。至于京房,“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22]3472-3473}。京房擅长以天象解说灾异,也是自成体系。汉代推言灾异的文章始于董仲舒,及至刘向、京房所处的西汉后期,这类文章已经确立固定的范型,是衰世乱世而使这类文章定型。东汉以灾异示祸为主题的文章集中出现在桓帝、灵帝两朝,也是乱世的产物。蔡邕传世的文章有《日蚀上书》《答诏问灾异》《答特诏问灾异》,都是以灾异示祸为主题。其中《答诏问灾异》序言称,光和元年(179年)七月十日,朝廷召集蔡邕、杨赐、张华、马日磾、单飏等朝廷大臣,传达天子指令:“朝廷以灾异忧惧,特旨密问政事所变改施行,务令分明。”^{[34]239}蔡邕的《答诏问灾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篇幅甚长、其他人当然也要遵旨撰写,是以灾异示祸为主题文章的集中推出。这个事件发生在灵帝光和元年,当时正值乱世。《后汉书·方术列传》首列八位与灾异星占有关系的方士,除排在前边的房檀、公沙穆之外,其余六位均是桓、灵之世的人。这也可证明东汉后期的乱世言说灾异之风颇盛,因此,以灾异示祸为主题的文章在这个阶段成批地出现。

灾异示祸、符瑞显德为主题的文章,分别初步定型于董仲舒、司马相如,而稳固定型于刘向、班固。司马迁生活在这两类文章的初步定型到稳固定型的中间阶段,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

也成为《史记》的重大主题之一。《秦始皇本纪》列举许多灾异,暗示这是上天向秦始皇提出的警告。《高祖本纪》着眼表现刘邦对各种符瑞的心领神会,对上天启示所作的巧妙回应^{[26] 369-370}。这是灾异示祸与昏君亡国相对应,而把符瑞显德与明君兴国创统相贯通,这在后来的史书中成为一种模式。

汉代文人推言灾异致祸,多数把灾异与人间祸患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所用的话语容易被人理解。也有的文章带有神秘色彩,用语艰涩,含义隐晦,不易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谷永是西汉成帝时著名的推言阴阳灾异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京房齐名,他所写的奏书中有如下几句:

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22] 3468}

这几句话的特点是用了一系列数字,破译这些数字的含义是解读的关键。“当阳数之标季”,颜师古注引孟康语:“阳九之末季也。”^{[22] 3468}成帝是西汉第九代天子,即前边所说的“承八世之功业”。九是阳数,孟康所言在这方面可取。至于把标季释为末季,则在情理上扞格难通。如果把标季释为末季,“当阳数之标季”就等于是说成帝处于第九代天子的末期,这无疑是对他的诅咒,谷永不会说出这样的蠢话。标,应释为标志。季,谓朝代,代。“当阳数之标季”,意谓处在第九代天子的位置,标示的是西汉的第九代天子。“涉三七之节纪”,颜师古注引孟康语:“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今已涉向其节纪。”^{[22] 3468}谷永的这篇奏书写于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距西汉王朝建立已经190余年,谷永在此前奏书中也提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如果按照孟康所作的阐释去理解“涉三七之节纪”,就等于说西汉王朝只有210年的寿命,你已经步入王朝的灭亡期。这无疑是对西汉王朝迅速灭亡,谷永如果真是这样陈述,难免招来杀头灭族之灾,他绝对不可能如此丧失理性。其实,这里所说的“涉三七之节纪”,三和七分别指十二地支的寅和午,它们在十二地支中分别排在第三、第七。古人对十二地支分别赋予象征意义。《史记·律书》:“寅言万物始生蟄然

也,故曰寅。”^{[26] 1245}寅是物之始生之义,具体指怎样一种状态呢?《说文解字·寅部》:“寅,髌也。正月阳气动,去黄泉欲上出。阴尚强也,象宀不达,髌寅于下也。”^{[35] 745}照此说法,寅字是物之始生而受到阻碍之义。髌,通“摈”。王筠称:“小徐说髌为摈斥之意(大徐本脱摈字,便难解),盖得其旨。”^{[36] 258}寅字指的出生受到阻碍,与寅对应的数字是三,所谓的“三七之纪”,三应指出生遇到障碍。

十二地支排在第七位的是午,《史记·律书》:“午者,阴阳交,故曰午。”^{[26] 1247}午指阴阳交,于人事指男女媾和。“涉三七之节纪”,意谓步入男女交媾而出生受到阻碍的时期,具体指成帝没有子嗣之事。此前谷永的奏书就建议成帝广纳宜子妇人,宁肯“得继嗣于微贱之间”^{[22] 3453}。由此看来,谷永的“涉三七之节纪”是专门针对成帝无继嗣而发,绝不像孟康所解释的那样是预测西汉王朝即将灭亡。后代基本是沿袭孟康之说,三七之厄被视为讖言。

三、范型之间的逻辑关联

汉代在文章样式、主题方面确立了一系列范型,各种范型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逻辑的关联。这种关联既体现在同一系列范型之间,又反映在不同系列范型之间。文章样式系列的范型之间,主题系列的范型之间存在内部关联,文章样式系列和主题系列的范型还存在外部关联。它们之间的关联按逻辑划分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因果关系、依存关系、两极互补关系。

首先看因果关系。汉代文学确立的主题范型包括悲士不遇和立言不朽,是因为立功无门而产生悲士不遇情怀,又因为悲士不遇而把文章写作视为人生的寄托,因此把立言不朽作为文章的主题。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两个主题之间也存在因果关联。《后汉书·班梁列传》结尾有如下评论:

时政平则文德用,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故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谨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

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23]1594}

太平之世多出现一系列追求立言不朽之士,文章写作得到朝廷的重视。与此相应,那些有胆略和冒险精神的人就要另寻出路,到边塞绝域去建功立业。班超年轻时就投笔而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23]1571}班超不肯久事笔砚间而投笔从戎,成为以激赏使者边功为主题文章的取材对象,这与班固的“密尔自娱于斯文”形成鲜明的对比。立言不朽和激赏使者边功两个主题的生成,彼此呈现的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再看依存关系。设辞、九体是汉代确立的两种文体范型。综观这两个系列的文章,基本都是抒发悲士不遇的情怀,只是设辞类文章是作者直抒胸臆,而九体文章则往往以屈原为依存。这样看来,作为文体范型的设辞、九体,成为重大主题范型悲士不遇的载体,悲士不遇主题依存于设辞、九体。汉代确立的重大主题范型有立言不朽,这类文章也往往依存于设辞。汉代确立的文学重大主题有盛世颂歌和刺世疾邪、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这两组文学主题之间也具有依存关系。盛世颂歌则铺排符瑞,刺世疾邪则推言灾异,盛世颂歌是以符瑞显德为依存,刺世疾邪则是以灾异示祸为依存。

最后看两极互补关系,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重大主题范型内部。汉代文学确立的重大主题范型主要有八种,可划分为四组。悲士不遇和圣主得贤臣颂,反映的是现实与理想的关联。悲士不遇是许多文人的现实处境,而圣主得贤臣颂表达的则是文人的普遍理想。士不遇经常可见,圣主得贤臣则是千载难逢,两者均成两极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这组重大主题也是两极互补。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又有逢凶化吉的愿望,这两个文章主题范型,体现的就是利与害、吉与凶之间的相反相成,对立互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写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32]445}董仲舒秉持的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理念,把祲祥、妖孽的出现与帝王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有其必然性。清人

赵翼有如下论述: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与人又渐觉亲切。^{[30]39}

所谓的“天与人又渐觉亲切”,指的是天人相通、天人感应理念。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主题,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天人感应理念,构成的是两极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这两个主题从生成层面考察,构成的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从意义层面考察,呈现的又是立言与立功的两极互补,两者并不构成对立,而是同属于人生不朽系列。盛世颂歌和刺世疾邪,亦属两极互补。汉代文学所确立的重大主题范型每两个为一组,彼此之间存在两极互补的关系,有内在的逻辑层次,因此呈现为孪生形态。

汉代在文章样式和重大主题方面确立了一系列范型,而诸多范型之间又存在逻辑关联,构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就此而论,可以说汉代文学之所以在历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系列范型。刘熙载称:“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37]10}刘氏对西汉文章给以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然而,并非“西汉文无体不备”,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文体是在西汉以后生成的。汉代确立了一系列文学范型,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范型的确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还在继续进行。

参考文献

- [1]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刘向编.赵仲邑注.新序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李兆洛编.骈体文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 [4]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5]鲁迅撰.顾农讲评.汉文学史纲要[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6]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欧阳询等编.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

- 籍出版社, 1999.
- [9]王先谦编. 骈文类纂[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10]张溥辑. 白静生注. 班兰台集校注[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 [11]林传甲编著.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武林谋新室印行, 1910.
- [12]王利器撰. 文子疏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3]刘向编纂. 刘向东校点. 列女传[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14]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5]刘向集录. 战国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6]李炳海. 黄钟大吕之音: 古代辞赋的文本阐释[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17]韩愈撰. 钱仲联, 马茂元校点. 韩愈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8]贾谊撰. 王洲明, 徐超校注. 贾谊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19]费振刚等校注. 全汉赋校注[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 [20]陶渊明撰. 逯钦立校注. 陶渊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1]陈元龙编. 历代赋汇[M]. 光绪年间双梧书屋俞樾校本.
- [22]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3]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4]许敬宗编. 罗国威整理.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5]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6]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7]吕不韦编. 高诱注. 吕氏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28]王充. 论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29]王符撰. 汪继培笺. 潜夫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30]赵翼撰. 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31]徐元诰撰.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2]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3]董仲舒撰. 凌曙注. 春秋繁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4]邓安生. 蔡邕集编年校注[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35]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36]王筠撰. 说文释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7]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tterns and Major Themes of Ancient Articles in the Han Dynasty

Li Binghai

Abstract: The model of article pattern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was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literatur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et words" is an article style composed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which develops from a short article without rhyme and title to a great article with rhyme and title. "Jiuti" is a style that evolves from an article without a title to a title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Qiti" is a style of presenting objects from variables to constants. The article styles of "Lianzhu style" and "text before poetry" are separated from the article style of integrated style to form an independent article. There are eight major theme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a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lamenting that scholars do not meet virtuous kings and praising the Lord to get virtuous officials; eulogizing the prosperous age and criticizing the secular society ironically; through writing books to realize the immortality of life value and encourage soldiers to make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frontier fortress; natural disasters and anomalies are used to show man-made disasters and natural auspicious signs to show the holy virtue of rulers. There is a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major article themes, which constitute three types of causality, dependency and bipolar complementarity.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Han Dynasty; model establishment; article pattern; major themes

[责任编辑/周舟]